

黄霞平



道教皇帝明世宗

在明代诸帝中崇道最笃者，当数明世宗朱厚熜，也即嘉靖皇帝（1521—1566年在位）。嘉靖十五年（1536）五月，一场大火烧掉了169尊佛像，和约13000斤佛骨、佛牙等物。在佛殿的旧址，后来还建起了慈宁宫和慈庆宫，以供张太后和蒋太后住。这是嘉靖帝对宫内佛教所进行的一次彻底的清除。至此，明代佛教之厄已极。与其堂兄明武宗信佛不同，明世宗反其道而崇道。明世宗给道士授以高官厚禄，在宫中广建斋醮、崇信乩仙，大兴土木，爱好青词，迷恋丹药。并自号为“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”，还给父母加封了道号。可以说，嘉靖皇帝对道教的崇信已达到了痴迷的地步。

明孝宗（朱祐樞），热衷于斋醮、烧炼之事，这即是受明宪宗（朱见深）崇信僧道的影响，又开武宗（朱厚照）、世宗两朝佛教、道教争长于宫廷中。明正德二年（1507）八月初十日，嘉靖

帝出生于湖广安陆（今湖北钟祥县）兴丑（朱祐杭）府内，安陆古属荆州，春秋战国时为楚地。荆楚之地百姓迷信神鬼、崇尚巫术的风俗，至明代并无大的改变。其父崇奉道教，与道观的道士过从甚密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对明世宗的崇道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；除此之外，还有个人身体原因——体弱多病，他自幼生长在南方，体质较弱，对北方寒冷天气不太适应；即位初期事务繁忙，身体也较劳累；嘉靖元年九月，一次就娶了三房妻子“一后二贵人”，有些纵欲过度；嘉靖元年十一月，他的祖母——寿安皇太后邵氏过世，一时悲痛不已，身体虚弱。嘉靖皇帝为自己的体弱多病而郁郁不乐。在他身边的太监崔文猜透了皇帝的心思，劝诱他举行斋醮以祈福消灾。嘉靖本来就对道教感兴趣，在崔文的怂恿下，开始了一系列的崇道活动。为此，他特地召见了入京师祝贺新君即位的道教

天师张彦。这种状况使杨廷和等朝臣上疏,要求皇帝停止崇道活动。在举朝一片反对声中,明世宗也不得不有所收敛。嘉靖三年(1524)二月杨廷和致仕后,世宗故技重演。他征召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(1459—1539)入京,专门掌管祈祷祭祀之事。由于祭祀的或多或少应验,令嘉靖皇帝非常高兴。随即封他为“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”,统辖朝天、显灵、灵济三宫,总领道教,赐金、玉、银、象牙印各一;“预宴奉天殿,班二品。又赠其父太常丞,母安人,并赠文泰真人,赐元节紫衣玉带”。不过,此时正值嘉靖皇帝锐意礼乐,建立个人功业之时,无多少精力放在道教上,并且他对道教长生不老的说法持很大的怀疑态度。

嘉靖十年(1531年)起,嘉靖皇帝对道教的态度由冷转热。结婚已近十年,竟还没有子嗣。这使他十分着急。决定在钦安殿建祈嗣醮坛。这样的祭祀活动每次由邵元节主持。为酬谢他,嘉靖帝“敕建真人府于城西,以其孙启南为太常丞,曾孙时雍太常博士。岁给元节禄百石,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扫,赐庄田三十顷,其租。又遣中使建道院于贵溪,赐名仙源宫”。随着嘉靖十二年(1533)和十五年(1536),皇长子与次子的相继出生,他对道教的怀疑态度改变了,开始相信道教能主宰人们的生死祸福。邵元节因祈嗣有功“加恩元节,拜礼部尚书,赐一品服。孙启南、徒陈善道等咸进秩,赠其父伯芳、太初为真人。”嘉靖十八年(1539)元节逝世,世宗追赠为少师,命从伯爵礼葬之,谥曰“文康荣靖”。启南官至太常少卿,善道亦封“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”。

嘉靖二十一年(1542)以后,嘉靖帝狂热地祈求长生。随着嘉靖帝之母蒋太后的病逝(嘉靖十七年),南巡路上嘉靖皇帝险些被烧死(嘉靖十八年),以及壬寅宫变中嘉靖皇帝差点被宫女杀死(嘉靖二十一年)一系列事件的发生,把自己的死里逃生以为是崇信道教的結果。他的思想和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嘉靖皇帝

对道教的信奉也由一般祛病祈嗣发展到狂热的祈求长生成仙的阶段。嘉靖皇帝在崇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宫婢之变后,嘉靖皇帝移居西苑。他从此不上朝,不出席郊庙典礼,不举行经筵,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斋醮、服食活动。“好鬼神事,日事斋醮”;虽“谏官屡以为言”,均拒而不纳。甚至发展到“经年不视朝”,深居西苑,开始宠幸另一道士陶仲文(1479—1560)。朝臣与他处于长期隔绝状态,只有道士陶仲文时常见到他。对道士陶仲文的宠幸,又进一步超过了邵元节。陶仲文因邵元节的推荐而得宠。陶仲文设坛布法驱除了连邵元节都无能为力的皇宫中的黑气,这使嘉靖对他产生了好感。嘉靖十八年(1539),授“神霄保国宣教高士”,寻封“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”。命他总领道教事务,赐给诰印,还封赠了陶仲文的父母。以其子世同为太常丞,子婿吴濬、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。这年冬天,嘉靖皇帝生病,在生病期间,陶仲文为皇帝进行祭祀,病好后,他以为是陶的功劳。于是特授他为少保、礼部尚书,还封陶的妻子为一品诰命夫人。

十九年(1540)十月,皇太子出牛痘,嘉靖命陶仲文祈祷上玄以祛病,不久,太子痊愈。虽然这些与陶仲文的法术全无关系,但嘉靖都把功劳归于陶仲文。特别是当嘉靖南巡时,随侍的陶仲文十分准确地预卜了行宫失火事件。所有这一切都从心理上征服了嘉靖帝。于是邵元节死后,嘉靖以陶仲文取代了邵元节。

陶仲文受到重用后,更加迎合嘉靖帝长生成仙的欲望,斋醮活动更加频繁,规模也更加扩大了。日以斋醮为事。耗费之大,据《明书》卷83载称:宫中每年要用黄蜡二十余万斤,白蜡十余万斤,香品数十万斤,以供皇家斋醮之用。嘉靖二十一年,又听从陶仲文所言,在太液池西修建佑国康民雷殿。移居西苑后,在陶仲文的引诱下,他整天讲道修玄,炼丹服药,祈求长生成仙。陶仲文说,如果能经常服用“先天丹铅”,就能长生不老,并进献房中秘术。陶仲文本人也是房中术的高手。榨取处女首经作为原

料,这种药物称为“先天丹铅”、“红铅”。命选大批幼女进宫。仅嘉靖二十六年(1547)、三十一年(1552)和三十四年(1555)等三次大选,就有760名8岁到14岁的幼女入宫。这些幼女都是为炼丹而用的。道士们为嘉靖帝进献的所谓仙丹,无非是铅硫汞砷类化合物,人服用后有兴奋末梢神经、引发性冲动的作用。服用了这样的丹药,每当药力发作,就随时临幸那些选来的秀女。

由于嘉靖帝一心修玄,对陶仲文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。一旦国家政务上有所成就,他都归功于修道的结果,而给陶仲文加官晋爵。二十三年(1554),加少师,仍兼少傅、少保。史称“一人兼领三孤,终明之世,惟仲文而已。”后又授特进光禄大夫、柱国、兼支大学士俸,荫其子世恩为尚宝丞。复以“圣诞”加恩,给伯爵俸,授其徒郭弘经、王永宁为高士。二十四年八月,又下诏追赠陶仲文三代,给予诰命,荫其孙入国子监读书。二十九年(1552),封恭诚伯,岁禄千二百石,弘经、永宁封真人。三十一年(1552),又诏增其禄百石,荫其子世昌国之生。三十三年(1554),又以“圣诞”加恩,荫其子锦衣百户。三十六年(1557),陶仲文有疾,乞归山。世宗念之不置,遣锦衣官存问,命有司以时加礼,改其子尚宝少卿世恩为太常丞兼道录司右演法,供事真人府。三十九年(1560)陶仲文卒,世宗闻之,痛悼不已,葬祭视邵元节,特谥“荣康慧肃”。“仲文得宠二十年,位极人臣”;其子孙及门徒皆受恩宠。

嘉靖皇帝又听说服芝能延年,于嘉靖三十五年(1556)八月,派人到五岳及太和、龙虎、三茅、齐云、苕鸣等道教诸名山广为采集。三十七年(1558)十月,礼部将四方进献的“瑞芝”一齐报上,共1860颗。受明世宗宠幸的道士,还有段朝用、龚可佩、蓝道行、胡大顺、蓝田玉、王金等,都以烧炼符咒得幸,但不久全失败了。

中后期嘉靖朝以崇道奉玄为中心。对大臣的选用,也以是否崇道奉玄为尺度。史上所谓“青词宰相”就出在嘉靖时代。青词本是道士做

斋醮法事时献给神的词章,没有治国安民的内容。每逢斋醮时,都要撰写青词,然后在醮坛上恭敬地焚化。最初,斋醮时所用的青词是由道士们撰写的,但道士所写的青词因文化水平有限往往缺乏文学色彩,令嘉靖帝不满意。嘉靖十年十一月,嘉靖在宫中设祈嗣醮时,礼部右侍郎顾鼎臣进呈《步虚词》七章,并且开列醮坛中应注意的事项,特别指出在斋醮第七天所进奏的青词尤为重要。嘉靖帝非常满意。顾鼎臣由此获得了嘉靖帝的信任。后人称“词臣以青词结主知,由鼎臣倡也。”由此开启了以后30多年词臣撰写青词的端倪。由于斋醮法事常年不断,撰写青词成了礼部官员的日常事务;而且青词写得好与坏,竟成了能否升官的标准。因青词得宠,甚至有“青词宰相”的称号。嘉靖中期以后的内阁首辅夏言、严嵩、徐阶等人,一方面自己精心撰写青词,以巩固自己的地位,另一方面又以此作为击败政敌的手段,青词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。嘉靖后期有四人靠写青词而得到皇帝的青睐,他们是李春芳、严讷、郭朴和袁炜。《明史·袁炜传》说:“自嘉靖中年,帝专事焚修,词臣率供奉青词。工者立超擢,卒至入阁。时谓李春芳、严讷、郭朴及炜为青词宰相。”

嘉靖四十五年(1566)十二月十四日,嘉靖帝因服用方士王金、申世方等所造丹药,火发燥怒不禁而死,享年60岁。服用仙丹不仅没有使嘉靖帝长生不老,相反加速了他的死亡。其地宫仿照道家九重法宫之式,可见他的崇信道教之深。

总之,嘉靖皇帝信奉道教的初期,他的动机多是为了消灾祛病,宗教活动是有节制的,对朝政危害也不大;只是到了中后期,即嘉靖二十一年以后,随着帝位巩固,对道教的崇拜日益狂热,才逐渐走上祈求长生不老,大搞斋醮活动,不上朝理政的荒唐的道路上去。明世宗的崇道,与唐玄宗和宋徽宗相比,有过之而无不及,是道教兴盛发展的终结。